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清初古文“醇雅而肆”的风格塑成

——以计东文章观及其古文书写为中心

于金苗

摘要：在传统文学史认知中，清初古仪型当推侯方域、汪琬、魏禧，乃“国初风气还淳”的典范。实际上，清初古文各家林立，未成一统。若将目光移注于其他古文家，来审视清初的古文状貌乃至“清文”由肆转醇典范地位的塑成过程，计东当可提供另一个面向。其学文之路与文章观念随着个人经历与写作重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入清后积极求仕，亲近官方，提倡根柢六经、昌明博大之文，推尊孔子、朱熹，宗式欧、归一脉；重视文以载道等文章观念，与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后真正肇兴的文治政策不谋而合，纵使被褫革功名也积极为“盛世之文”张帜；有意重构唐宋古文，呈现出“醇雅而肆”的书写特质。可以说，以计东为代表的文人的文章观念及古文书写恰是彼时时代、文治、身份综合影响下的产物。

关键词：计东；唐宋文；醇雅而肆；清文典范

提及清初散文，我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于“国朝三家”侯方域、汪琬、魏禧，视之为古仪型，但这样的文学史认知是基于人为的“文化建构”历史事件。^①宋荦等人以“三家”为文章矩矱，旨在树立清文典范，彰显本朝文教。实际上，清初古文在布衣之文和缙绅之文分野格局下，随着文化权力的转移，呈现出由肆转醇的演变过程，折射出清初古文的变迁理路。而身处这种变迁进程中的古文家计东^②则能体现清初古文的另一个面向，为我们进一步审视

和了解清初古文状貌提供了丰富而多样的有益视角。在明代止于诸生的他，入清后试图通过科举来实现自己“努力振衰宗”的家族使命，缓解

① 参见郭英德：《文人典范·文章矩矱·文治气象——“国朝三家”说平议》，《文艺理论研究》2019 年第 6 期。

② 计东（1624—1675），字甫草，号改亭，江苏吴江人，明诸生，清初古文家、诗人。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顺治十八年（1661）误奏销案，功名被褫。其一生为衣食游谒南北，郁郁不得志，诗文因好游而益工，著有《改亭诗文集》《甫里集》等。

文人期许有用于世的功业焦虑,其中亲近官方、倡导“盛世之文”是他的策略之一,尤其是文章观多与康熙十八年(1679)博学鸿词科后真正肇兴的文治政策相映照,但对于“道”的至高追求和自我期许,又让他的文章观念出现心手相违、龃龉矛盾等特征,加之跳荡不羁的个性与多年游走经历,其古文书写呈现出“醇雅而肆”特质,在清初一众古文家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基于此,本文以计东为切入点,根据其生平经历与写作重心的变化,以其文章观念与古文书写来观照清代前期古文的格局与状貌,以期为清文典范的确立提供另一面向和维度的考察。

一、寻求“道”“器”平衡的学文之路

接受作“文”训练、具备为“文”素质与经世才能是古代每个有志于世的文人的必经之路,而作时文以为“器”与攻古文以明“道”间常常难以兼顾,但期求两全者代不乏人,计东就是力图寻求其中平衡点的代表文人之一。与清初众多古文家的学文路径相比,计东的学文之路颇具普泛性。起初,他为功名学作时文而以求“器”为主要诉求。学作时文确为明清时期应试科举的不二法门,而经义之文最初并无定式,用骈用散皆可,直至明成化年间才逐渐定型,一般骈散兼用且以骈体因素为主体,这就决定了计东的蒙学教育必然以骈体训练为主。据计东自述,他是从十五岁开始真正学作时文的:“伊予年十五,学为场屋文。”^①初学的他对八股名篇的诵读尚是一知半解,“成诵苦不熟,夏楚烦先人”^②,当是彼时学习的常态。但实际上早在此前,计东在童子时便接受父亲的督课,并进入家塾随从祖计大章学习,早早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研习内容必然少不了讲求对偶、声律、技法的时文。自幼天资聪颖,加之早早接受作文训练,他七岁便能文闻名乡里。

值得注意的是,计东也不废对“道”的追摹,几乎在接受时文教育的同时便开始了古文的学习:“又追念东年八九岁时,先人日督诵欧、苏文章。稍长,又知读陈无己、张文潜之文,羡慕之不敢忘,忽忽二十余年。”^③他秉承“文以载道”的文道观,诵习古文名家著作,尤其是宋

代古文名家如欧阳修、苏轼之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并在此基础上又扩大学习范围,研习陈师道、张耒的文章。从他的学文路径可以看出,其所学正是传统的唐宋古文。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计东这一时期的古文学习,不过是为时文写作铺路,提供更为丰厚的养料和素材,在“道”与“器”之间无疑更偏重于“器”。

除了家塾学习外,父亲计名也对他多方教诲引导,倾注了不少心血。计名屡屡指点计东研读当世八股名家之文。崇祯十二年(1639),督课16岁的计东诵习王士乾、王世显兄弟制艺:“己卯湖广省试毕,天下争传诵王氏怀人、亦世之文。先君子举以督课,予必成诵乃已。”^④崇祯十三年(1640),带计东读书于楞伽山寺,命其以父执之礼事“每一艺成,同学传诵,争相缮写”的赵炳。赵炳的时文“根柢经术,纬以精思,峻洁峭拔,不欲一字袭前人”^⑤,在当时士子间颇受追捧:“甲午,行牒奔走海内。至乙未下第后,远贾犹重趺持兼金购其书。……人之习其文而取科目者,不可胜数。”^⑥以上种种只是计东诵习制艺名家之文的缩影,为彼时的他提供了丰富的时文养分。

计名不仅督促引导计东接受时文教育、掌握八股技法及对实践对象四书五经等经学著作的研读,还有意培养他的理学、古文等综合素养。计名不仅命子诵读大家著作,所延请名师亦是当世巨儒,可见寄望之深。计东八九岁时,便在父亲授意下接触理学大儒吕坤的著作《四礼翼》;十三岁起,从复社巨擘张溥学文,讲习内容以经世致用为主,论次历代名臣奏议、诵读《嘉隆疏抄》《明经世文编》等;十六七岁,师从经学大家黄道周,听其讲学于浙江大涤山;年岁稍长,又从学于理学大家刘宗周,习读理学名家高攀龙、顾宪成、邹元标等人文集。多方的求学研读、广泛的阅读诵习,为计东的制举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①② [清]计东:《广陵五日讌集作》,《改亭诗集》卷一,清乾隆十三年(1748)计瑛读书乐园刻本。以下所引皆据此本,不再具录。

③ [清]计东:《颍州重复西湖碑记》,《改亭文集》卷十三。

④ [清]计东:《云间赠言册序》,《改亭诗集》卷二。

⑤⑥ [清]计东:《赠赵明远序》,《改亭文集》卷五。

许是根基尚浅,年仅十一岁便参加童子试的计东名落孙山,不禁心生彷徨:“伊予年十一,摇笔为文章。健如初生犊,跳荡不自量。小战偶再北,便觉心彷徨。”^①这时所谓的“文章”,当是指应试所必需的时文。所幸经过数年的苦读,计东终得主考官许彥激赏,获称“神骏”,科场连捷,声名鹊起:“崇祯己卯春,拔我童子场。逾年再校士,赏誉倏非常。呼予曰神骏,叹予才无双。自此大有声,交游起辉光。”^②可以说,计东早年学文阶段,已充分具备时文写作才华,得获诸生即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证明,而此际古文创作尚未在他着意关注的视野之内。

随着慈父、恩师的相继离世,加之明清鼎革,计东的学文道路和文章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入清八年后,计东个人的身份焦虑胜于对气节操守的坚持,选择了由士为仕的应举之路,而这关乎气节的出处选择也让他与遗民身份无缘。在父亲去世后,计东还保持着积极向制艺作手学习的准则,但又不满足于此,投拜当世业已高中且任职官者为师,这无形中给他的应举之路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便利。他诵法学问淹博、影响江南文风甚巨的顾宸之制艺,赞许“今天下海隅日出之乡、无雷凿齿之域,其人无不知诵法辟疆园顾先生所丹黄甲乙之文及其注撰诗古文辞与制举业者”^③。这位操文场选柄数十年之久的制艺名家看中计东的时文,在顺治八年(1651)的选例中独推许于他,让他得以扩大声名。自顺治十二年(1655)贡入太学起,他又从王崇简学作时文。顺治十四年(1657)中举后,他又顺应当时的风气拜曹本荣、宋之绳为师,研穷理尽性之学,其制艺深得主考官宋之绳称许:“从文见道,愿以斯事长城属子。”^④计东在人生后期对理学、心学的变化也主要源自此二人,且通过座师也得以结识京师要员,为他后来的游食提供了多种治生途径。而他的文章观念以及行文风格也有所变易,“道”与“器”的天平在此际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顺治十三年(1656)与陈维崧为应举一同读书于宋德宜寓所可以看出,计东此际已不再是董说在崇祯十六年(1643)所谓“甫草文章霸一代,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之言,益人意气,豪杰士也。不得其平,愤发不可止,

拔剑击地,散发问天”^⑤,而是“嗜苍凉古直之作”^⑥,文章风格也随之一变,与陈维崧的“惊艳绝丽”^⑦形成鲜明对比。

彻底让计东转变文章观念,放弃时文之“器”而专攻古文之“道”的契机则是顺治十八年(1661)的奏销案和康熙元年(1662)长子计准的离世。他先是在奏销案中因误被黜,革举人身份,不得再入闈策,就此失去进身之阶,又于次年痛失长子,心理发生较大变化,自谓“予被废之明年,又丧我长子准,自念既穷于世,独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见’耳。故癸卯、甲辰后,始肆力于古文辞”^⑧。用心于古文之“道”的计东,曾学文于同出吴中的汪琬,而吴中又以宗法欧阳修、归有光为主流,二人身上都有唐宋派的影子。尤其是在学习归有光古文上,计东几可以假乱真。

总体来说,计东的学文路径是典型的古文、时文兼学又转益多师。康熙初年转而追求古文之“道”为自我毕生追求的举动,既说明他文章观念再次发生转变且日益完善,也昭示着他开始以散体写作为主导的为文倾向的确立。从功利性的角度来看,计东从时文到古文学文之路的“道”“器”转变,所谓的“肆力于古文辞”,当是不得再入闈策后被迫放弃时文的无奈选择,而学司马迁“垂空文以自见”则是文人身份焦虑作用下期有用于世的自我调整。若将计东置于清初文坛来考察,会发现他的为文路径具有典型意义:前期为应试不得不长年研习时文之“器”,古文之“道”多是作为附庸而学,后期或因易代,或因高中,或因被褫等因素,弃“器”而求“道”,可以说这恰是清初古文家们常见的学文路径。如魏禧、王猷定、邱维屏、曾灿等因易代而弃制义学古文,邵长蘅、王昊、吴兆宽等因

①② [清]计东:《赠许于王侍御》,《改亭诗集》卷一。

③ [清]计东:《顾天石诗集序》,《改亭文集》卷三。

④ [清]计东:《前明太仆寺卿溧阳宋公行状》,《改亭文集》卷十六。

⑤ [清]董说:《计甫草诗序》,《董说集》前集卷二,民国三年(1914)刻吴兴先哲遗书本。

⑥⑦ [清]计东:《赠陈子万归宜兴省兄年序》,《改亭文集》卷五。

⑧ [清]计东:《竹林集自序》,《改亭文集》卷二。

奏销案除名而谢举子业后肆力于古文,汪琬、施闰章等则是因高中而舍时文、攻古文。

二、时代、文治、身份焦虑交糅下的文章观

对于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其文章观念及文学书写不能不浸染于时代、文治,在身份焦虑驱使下,不断在自我与体制间游移,这一特点在历经易代的计东身上尤为明显。他在不同的时代节点根据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文章观念,力图在体制与自我间寻求一种平衡。论及计东的文章观,和他同出一乡、同属唐宋派的汪琬不能避而不谈。毋庸置疑,汪琬作为清初士大夫文学的代表性人物,集“道统”与“文统”于一身,具有鲜明的“清文”意识,其文章观念多与官方导向相合,对“清文”的确立贡献巨大。^①然而,关于“清文”的确立,学界多将目光集中于以汪琬为代表的在朝士大夫身上,而计东等在野古文家,在清文确立过程中是何立场、有何主张,鲜有人关注。可以说,汪琬与计东分别从在朝与在野两个面向对清文典范的确立进行了自我阐释和呼吁。

因计东的文集收录的是入清后的作品,所以他在明时的文章观念如何我们很难知晓,不过从诸多细节中或可推知一二,主要表现在对明代虚浮文风的批判和对制艺的反思。计东在《赠黄继武序》一文中历数有明一代会元之文,评价得失,尤为赞赏“不事雕饰”^②的制艺文,又梳理了明初至隆庆、万历时期的制艺名家,并覘一代八股文风的变迁路径,选取会元之文无疑看重其代表性和对一代文风之影响,因之,研习、揣摩会元的制艺也成为历代举子的应试捷径,亦可视作八股文演进的一条线索。尤其是对晚明制举之文,计东认为,“吴无障以偏锋伤气,汤霍林以柔媚败度”,这虽是晚明文运衰竭之始,但肯定其中的霍勋、吴伟业之制艺,赞其风神不逊前代。“明三百年以来,以制义称者前四家则王、唐、瞿、薛,后四家则归、胡、汤、杨最著,余若冯开之、陶石簣、邓文洁、董文敏诸公制义,后生学者奉若科条。”^③他所称赏的制艺名家代表了明代八股文的两个时期,其中隐含了

“以古文为时文”的发展脉络,以古文气脉融入时文之中,如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归有光、胡友信等人,都是大力改革八股文的代表作家,显示了计东对古文的认同。

清朝定鼎后,首开科举的八股文仍沿用有明一代的体式、内容和作法,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定,亟须革除科举弊端,纠正、摆脱明末文章空疏流弊,形成具有自我特色、利于统治的清文,不断调整着的官方功令,使其更易于控制士人思想、利于自身统治。在民间层面,易代剧变引发计东等士人的反思,希冀“救世”,表现出提倡经世致用、看重文章的载道功用、反对虚浮矫饰文风的倾向。这种在清初文坛的普遍共识,可以说是士人与官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而殊途同归的结果。

入清八年后的计东,依然选择应举,积极想投身体制之内,由“士”转为“仕”。在这一过程中,他反思明代时文空疏文风,批评清初那些空疏剿袭的古文,反对虚浮空疏、毫无性情的文风,批评一些为文者失于专、忘乎本,以至作古文而似时文一样空疏纷乱:“今之为文章言者,我未见其所为诚一者何在,所谓本者何在也。而其文殆无所不欲言,自以为洋洋洒洒矣,及按其实,则皆空疏瞽乱,有似于今之为制举策者,相率而号于人曰古文,我甚伤之。”^④针对诸多不利体制、不谐科举的弊端,计东给出了自己的疗救方法:主张根柢六经,更为看重经术之文之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提倡盛世应以经术治国,表现出与官方统治的呼应:“盛世以经术治其国。”^⑤诚如友人汪懋麟所言,计东古文“抗志在删述,探源本周秦。文从五经出,自然学问纯。中有经济策,名言浩无垠。岂若鲁诸儒,章句死逡巡”^⑥,认为“六经灿然天地间”^⑦,主张要以经学为本:“经学之重于天下久矣,学者舍经

① 参见李圣华:《汪琬的古文理论及其价值刍议》,《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

② [清]计东:《赠黄继武序》,《改亭文集》卷五。

③ [清]计东:《赠宋牧仲序》,《改亭文集》卷五。

④ [清]计东:《董文友文集序》,《改亭文集》卷二。

⑤⑦ [清]计东:《卓氏传经堂记》,《改亭文集》卷八。

⑥ [清]汪懋麟:《赠计甫草》,《百尺梧桐阁集》卷六,清康熙刻本。

学则无以为本也。”^①他还诵法孔子之道“囊括天地经纬古今”^②,看重由明到清统治者所标举的儒家传统文学观:“明以制艺取士,凡士之取卿相大官者,无不诵法孔子之言,润色其辞,以附会孔子之道,其法至国朝不废。”同时也批评“明制艺之设二百八十年,里巷小儿禀承庸父兄之训诂,即操笔墨,沾沾焉附会孔子之言,至以其文取卿相、致功名,而懵不知孔子之道为何如者……懵不知者乃人人操笔而附会其说”^③。他希冀文人能如韩愈所提倡的“得其船与楫沿而不止,其几于道不难也”^④,追根溯源,从文而见道。可以说,对根柢六经、诵法孔子的呼吁,正是清初士人为挽救古文空疏浅薄之弊,使唐宋文能够根植于正统文化,获得传统的权威依据,并晋升为“正统”文化权威的着意选择。

计东的独特之处在于,纵使顺治十八年(1661)不得再入闈策,他对具有浓厚官方统治意识的科举、制艺并不完全否定,认为若结撰得当,则可使之成为不朽之物,关键在于人:“苟作者之志力必欲其不朽,则遂不朽焉。”^⑤他反思明代二百八十年以制艺取士却“可传者少”,将原因归咎于写制艺者,而非制艺本身:“其人皆借制艺为梯,荣媒利之资,有苟焉以取之心,揣摩浅陋和软可喜之文,侥幸于世俗之遇。既遇之后,已视其所作即速朽亦甘心焉,则其人之心,先已朽矣,咎岂在制艺?”^⑥他眼中的制艺也离不开宋元儒学,显示出对朱熹以来诸儒的尊崇:“深醇隽永,一字不苟设,实能发明宋、元、明诸儒所以羽翼经传之意。”^⑦更强调对孔子为首的先贤的宗式,主张优秀的制艺者发文应根柢六经,无愧圣贤:“若其命笔之时,先有矜慎立言之志,深思圣贤之微言奥义,一审乎心所安而发之,可对越圣贤而无愧,则其志固已盖天下矣。其平日之业,又能讨论《经》《传》之同异,直探诸儒穷理尽性之学,使我力油然而生,沛然足以达其志,且其心自无逢迎世俗、扰扰得失之念,而出其专一精锐之力以行文,必能显当世而传之不朽。”^⑧目今所存文集中,计东在文辞间虽有怀才不遇之叹,却并无对朝廷的怨怼之词,这一方面是因为彼时文网渐密,对江南士人控制甚严使得他不敢如此,另一方面也因其文学理念与官方的文化政策显示出某种程度暗合。当

然也要注意,计东文集是经汪琬删减而成,其选辑必然按自我标准进行,其中是否有过于怨怩的言辞被删改,被剪裁切割,保留那些符合官方所倡导的醇正和雅的文辞,我们不得而知,但目今所见资料呈现出的计东文章观念有亲近官方倾向,与“盛世之文”相映照,屡屡对官方政策有所呼应。

计东的文章观念与官方文化政策的重要连接点是“盛世之文”理念的趋同。严格来说,清廷文治政策虽在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后真正肇兴,“盛世之文”之风亦始于康熙朝,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⑨等特点,在顺治朝便已初见端倪。承平的生存环境、天子的文治策略,是形成此种风尚的基础。从计东视角看,他早已注意到两代天子有意崇尚文治的倾向,在求取功名的过程中难免会向官方政策靠拢。他意识到,顺治帝早有意识崇文尚儒,也注意到康熙是一位颇具“盛世意识”的帝王,更为崇尚文治,有意厘定清文典范,提倡清真雅正的文风,不断强化程朱理学,树立“道统”与“治统”。计东虽没有像汪琬一样明确提出“盛世之文”这一概念,却表达了相近的内涵和理念,且早于汪琬近十年。汪琬于康熙十五年(1676)左右在《文戒示门人》中提出:“昌明博大,盛世之文也;烦促破碎,衰世之文也;颠倒悖谬,乱世之文也。”^⑩由此表达了对“清文”的期许。而计东早在康熙六年(1667)即提出:“以昌明博大之篇章,发舒其赅博精覈之经术,使天下后世读其文,想见国家文教之盛。”^⑪昌明博大之文、根柢经术、国家文教,无不是官方所倡导的盛世之文的关键要素,显示了与后来官方明确提出文治策略的契合度。其实这种经世情怀

① [清]计东:《王子重五经制义序》,《改亭文集》卷三。

②③④ [清]计东:《李草楼制艺序》,《改亭文集》卷四。

⑤⑥⑦⑧ [清]计东:《叶慕庐制艺序》,《改亭文集》卷三。

⑨ [清]王兆符《望溪文集序》中引父评方苞语。[清]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下),第906-90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⑩ [清]汪琬:《文戒示门人》,《钝翁续稿》卷三十, [清]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三),第1665-16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⑪ [清]计东:《赠黄继武序》,《改亭文集》卷五。

与抱负早有端倪。崇祯十七年(1644),他就曾痛感明朝衰颓,辑《筹南论》十万余言上书史可法,力图经世济国;顺治十三年(1656),也曾着力向当事者推荐有治平大略、善救乱之言之贾开宗,立足点亦在成一代之治:“见先生所为策略,购而缮录之,将携入京师,谋所以献先生书者,使当世能采用其言,必能成一代全盛之治。”^①

遭褫革后,计东虽自言“心如寒灰槁木,为人摧抑虐侮,不复一动其心”^②,但仍不安于居,选择不停游走投谒,以此为生存策略,寄身权贵幕僚十余年,间为塾师,这不失为身份焦虑所催生出“立功”渴望的一种权宜之计。他在坐馆时仍十分看重科考一途,明示诸弟子要将制艺放在首位,其重视程度远超诗文:“仆初愿与足下辈粗毕制举之业,各有所成立,始旁及诗、古文之学。”^③同时,他也不否定科举制度乃至官方的统治策略,更为亲近官方立场。他对清初制科颇为称赏:“国朝制科已十举,凡为会元之文,靡不彬彬可观。”^④他认为官方罢八股、尚策论的政策“俾士得以经济自见于前之为矩矱神明,莫可求合”^⑤,“功令之所以罢八股、尚策论,将以网罗天下学古之士”^⑥,显现出深为理解之上的支持,俨然站在官方立场。虽然我们要考虑到其言行的特定场合、身份,以上言论是否有出于情面、避忌、奉承等因素造成的言不由衷,但细究可以发现,此际的他已不得再入闈策,此种言行应更多出于内心的真实想法。当然,他对清初时空疏的文风也有所批判,将改革后不见成效归咎于应制者未能纠正空疏旧习,有负于朝廷苦心:“空疏黻靡,与八股异体而同习,宁不亦重负功令哉?”^⑦甚至连朝廷废而复设副榜,他也能从大局出发揣度圣心用意:“圣天子酌复旧章,即此事甚细,亦足为鼓励人士之一端也。”^⑧

从以上计东的种种表现来看,他有意重新建构唐宋古文,极力批判时空疏之弊,却认为作文者矜慎立言、发圣贤奥义,便可成不朽之文,同时又极力推崇散体古文。种种文学观念都指向了同一旨归:无论古文还是时文,都应能更好地承担载道、匡时、救世等功用。所以他在根柢六经基础上溯法唐宋古文,颂扬“欧、苏两文忠公人文之项领”^⑨,效法推崇韩愈、欧阳

修、曾巩、归有光等人,正是看中其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主张。以计东为代表的一批清初士人,历经国家覆亡,积极反思明亡原因,期望承续有明一代之文,又因身份的焦虑不得不在新朝顺应文治政策,寻求契合时代思潮的最佳书写载体,因而力图重构唐宋古文典型,既能载道又经世致用而足辅文教,使之最终成为清代文章的“正体”。

三、文治观念与古文书写兼容的 “醇雅而肆”

康熙三十三年(1694),宋荤、邵长蘅等人编纂《国朝三家文钞》,侯方域、魏禧、汪琬即被目为古文仪型。乾隆四十六年(1781),永瑆等编《四库全书总目·〈尧峰文钞〉提要》称三家是“国初风气还淳”的典范:“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禛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琬与宁都魏禧、商丘侯方域称为最工。”^⑩“风气还淳”由此成为众多文学史家对清初文风的典型概括,而讲求“唐、宋以来之矩矱”也正是彼时文坛走向醇雅文风的趣尚。

事实上,《国朝三家文钞》问世前的清初文坛呈现诸家并立的局面。或独推侯方域古文第一,或以汪琬、魏禧两家并称,或以侯方域、魏禧相埒,或以顾炎武、汪琬、朱彝尊三家并立。在诸多纷繁的声音中,胡介祉将计东、王猷定、魏禧古文目为可与侯方域相接踵者:“侯公子《壮悔堂集》,其必传者也。与公子后先接踵者,豫章王于一猷定之《四照堂集》、宁都魏冰叔禧之《易堂集》、吴江计甫草东之《改亭集》,皆在伯仲之

① [清]计东:《贾静子先生私制策序》,《改亭文集》卷四。

②③ [清]计东:《赠陈翁余序》,《改亭文集》卷五。

④ [清]计东:《答诸弟子论诗二十五则有序》,《改亭文集》卷十二。

⑤⑥ [清]计东:《赠黄继武序》,《改亭文集》卷五。

⑦⑧ [清]计东:《姜西溟真意堂论序》,《改亭文集》卷四。

⑨ [清]计东:《颍州重建文昌阁碑记》,《改亭文集》卷十三。

⑩ [清]永瑆等:《〈尧峰文钞〉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武英殿刻本。

间。”^①足以瞻见计东在清初文坛地位之一斑。综观而言,侯方域、魏禧、汪琬虽然基本是以取法唐宋自立,但侯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②,尚有骈文积习,未臻醇雅;魏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③,更多地浸染公安派习气;唯有汪琬“原本六经”,“气体浩瀚,疏通畅达,颇近南宋诸家。欧、曾未易言,以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④,被目为古文正传。在众家纷立中,计东以其精粹而醇肆的古文实践将文治观念与古文书写兼融,体现了清初文坛的醇雅走向,透视出清初古文演进过程中的个体面貌。

自肆力于古文后,计东矢志以文名流传后世,俨然以古文家自命。文学书写中对句、用典等的运用旨在调整行文节奏,提升表达效果,拓展文章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计东在古文书写时虽乐于用典,也用对句,但并不注意音律的对仗与否,文章外在形式为内在内容服务,并不苛求形式,这正是他学习唐宋散文体化的结果。跳荡不羁的个性,多年的应举经历,与官方文治的不谋而合,取径唐宋的学文之路等多重因素作用,让他的古文辞藻并不繁复华丽,而是呈现出醇雅而肆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为文醇雅有法,看似无意而波澜老成。行文醇正雅驯是计文一个突出的书写特质。如《大司徒王公寿序代》是一篇典型的醇深尔雅的经典之文,稽古《周礼》《王制》《周官》诸书所载大司徒之责,中间以汉唐以后“太宰不司钱谷,司徒专制国用”兴起波澜,不巧不凿地引出司徒王公“爱国奉公、进贤报主之心,上格于天如此”^⑤,命意新颖,用典恰切。这恰是他根植经术又着意经营醇雅的结果。再如《卓氏传经堂记》引论经史,叙事简劲,写得精醇深厚,极有生色。他如《谷似堂记》渊雅而沉郁顿挫,是典型的情至文至之文。醇雅之余,计东承袭明代唐宋派创作技法,行文还讲求文法:“尽管清初士人对‘法’的内涵的理解各有偏重,对‘法’的效用也褒贬不一,但是当他们的创作论的角度回答‘唐宋古文如何书写’的问题时,大都明确指出,唐宋古文着意于文法的讲求,甚至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因此堪称‘文体’之‘正’。”^⑥计东为文之法是经过刻意经营的,但又不完全

看重文法,难得之处在于能“逐步入题,若无意为文”^⑦,化解斧凿痕迹而使文章波澜老成,自成机杼。如《前明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户部尚书侯公墓志铭》一文,以忤逆珰党、智识将相两件大事作主脑,文作三层,与“党祸”起结,详叙侯恂一生功名志业,尽力摹写,起结应伏,一丝不乱,谨严有法又能变化无痕,叙致风力神采俱佳,被徐作肃赞为“在甫草近集中为第一合作,宜朝宗之见梦于偶更堂中也”^⑧。再如《寿大司马合肥龚先生序》,先是总述大司马、大司寇、御史大夫由来,继而详述其沿革、职责,以“以三大官分治之而不足”为关纽,总挈前文,照应后文,引出大司马龚鼎孳,历叙其功德、政绩,井然有序,一丝不乱,末以作祝为结,于全文不增添、不渗漏,恰合一篇主意,文笔老到,结束精整,布局紧凑精严,被王士禛认为是计东文集中“第一惨淡经营文字……此等文非神明变化于大家之法者不能作”^⑨。究其原因在于计东为文有法,精心设置文眼、分提、入题、总提、总束,使得文章烟波起伏无限而又不见杂乱,这也是计东行文的特征之一。

其二,长于写“情”,缘情而发。以“情”动人也是计东古文给人的重要印象之一。和唐宋派的很多古文家一样,他的创作观念十分看重“情”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在创作中尤为注意投注一己之“情”,但不刻意经营,主张缘情而发,“各自言其情志,不问工拙也,不患得失也,率然成之,

① [清]侯方域著,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上),第56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②③ [清]梁章巨编:《退庵随笔》卷十九,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④ [清]永瑛等:《尧峰文钞》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武英殿刻本。

⑤ [清]计东:《大司徒王公寿序代》,《甫里集》卷二,清康熙刻本。

⑥ 郭英德:《唐宋古文典型在清初的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⑦ [清]徐作肃评语,参见[清]计东:《赠商丘陈子万归宜兴省兄其年序》,《甫里集》卷二,清康熙刻本。

⑧ [清]徐作肃评语,参见[清]计东:《故明资德大夫正治上卿户部尚书侯公墓志铭》,《甫里集》卷六,清康熙刻本。

⑨ [清]王士禛评语,参见[清]计东:《寿大司马合肥龚先生序》,《甫里集》卷二,清康熙刻本。

偶然得之,作者不自知其可传,亦不求传于人”^①。最能体现他为文重情而又情感真挚自然的当属祭文、行状、墓志铭,尤其为亲人、挚友所作之文,最是真切动人。如为祭奠为长子殉节的儿媳所作祭文《祭冢媳孝贞宋女文》:“呜呼!媳之德甚厚,舅姑不能为报,汝姑自闻汝丧,日夜哭泣,左目眚矣。今将来哭,抚妇棺,招妇之灵归于我家,与我子合食于祠堂,且卜吉地合葬,且谋立后之事,使媳夫妇蒸尝有所凭依。呜呼!庶几媳十年来绝痛之隐衷不可以告尊亲者,今或可于梦魂之中一告姑嫜乎?歿后将百日矣,冥冥之中果见我子乎?”^②将连失爱子贞媳之痛写得缠绵悲婉,字字进泪而无庸辞之藻,知情惜情而格外动人心魄。再如给表亲董方南的送序文《送表弟董方南南归序》,详叙二人母亲为同产的亲缘关系,带出骨肉穷达死生遭际之叹,一字一泪,动人心魄,堪称情至之文。计东为友人所作赠序文也是缘情而发的典范。再如书、记一类文章中,也常有情至之文。如《谷似堂记》写得渊雅周密,沉郁顿挫,读来令人倍增师弟友朋之重,是情至而文至的典范之作。再如《与丁药园书》仅二百余字叙写与徐作肃、宋实颖之友谊,文情如哀泉咽危石,足令人叹赏友朋之重。

其三,远肖韩、欧、归一脉,奇横恣肆。如果将计东放在古文发展脉络乃至整个散文史中加以考量可以发现,摹写诸家恰是他继承唐宋古文传统的重要表现之一,也体现了他取法乎上的古文准则。计东延承唐宋古文一脉,又受唐宋派熏染,韩愈、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都是他宗法的对象,为文技法上难免有诸家影子。他的文风以“奇崛”“奥旨”显现“肆放”的特质,与韩愈颇为神似。如《赠姜西溟序》一文用意愜当,机神飞动,通篇以16个“知”字步步作结,中间波折自然,文之大旨与韩愈《与冯宿论文书》《答李翊书》颇类,深得韩愈“奇辞奥旨”之真传。计东在行文风神上,也有近于欧阳修之处,如《前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叶公墓志铭》一文堪称摹欧入化之作。该文先是总述世系、官阶、生卒之概,复仿欧阳修之文从兵事发论,以“顾独好谈兵”^③一句挈起,逐段详叙兵略,最后以唱叹结之,通篇风神顿挫,尤有气色,深得欧文之髓。计文也有苏氏父子的影

子,如《贾静子先生私制策序》一文,^④通篇只就贾君老而不遇生出文情,中间辅以议论,极似苏氏父子手法。除此之外,计文还留有战国纵横家之气,这也是战国文风影响唐宋诸家的结果。如《送娄东王藻儒孝廉下第南归序》,前半段虽失于繁琐,后半段仍能以无生有,奇识至论甚为精悍,行文间涌动着战国纵横之气,这些都让其文兼具“肆”的一面,且呈现出“以气胜”^⑤的特点。这与他被认为“诗挟小四海,卑视万古,或鼓或罢,或泣或歌”^⑥、“勃勃有飞扬之气”^⑦之类的评价应是一致的。

其四,为文尚奇,讲求笔法与用意。计东古文中“奇”的一面尤为突出,这也是他追求“肆”而呈现的效果,主要表现在笔法、用意、议论之奇与肆。如《读王阮亭论诗绝句记》,通篇用笔如架空中楼阁,全是架空构造,极意烘染,交心甚奇,并借题抒发胸中抑郁不平之气,顿挫感慨,呜咽淋漓。再如《严方贻稿序》一文以严曾渠与自己落第南归起撰,然步步结于李念慈言愁之诗上,笔法变化出奇,中间杂以不能忘情,抑郁难平之气肆意而出,顿挫低回,议论奇穷。再如《送钱础日游泰山阙里序》一文,开头便突起奇崛,通篇更是古质苍奥、古趣横溢,章法亦奇肆,感慨又寄于文句之外。

总体来说,计东古文醇雅而肆的特征的形成也离不开与其他古文家的学习与切磋,诸人的风格与观念可以说有同有异。同样是取径唐宋的汪琬,以最为笃好归有光著称,计东与归有光更是异代相契,学归最肖,在有清一代很长时间内被视作震川传人。王崇简赞他学归几至出神入化以假乱真之境:“其叙述高洁,起伏贯变,承接脱化,参之熙甫集中,正不知孰伯孰仲也。志传更属超逸。”^⑧这种评价一直被延续下来。王士禛之子王廷扬认为计东之文合欧阳修、曾

① [清]计东:《游晋草序》,《改亭文集》卷四。

②③④ [清]计东:《改亭文集》卷十五、卷十四、卷四。

⑤ [清]董以宁:《计甫草文集序》,《正谊堂诗文集》,清康熙书林兰荪堂刻本。

⑥ [明]董说:《董说集》前集卷二,民国吴兴丛书本。

⑦ [清]计东:《与宋牧仲书》,《改亭文集》卷十。

⑧ [清]王崇简:《答计甫草》,《青箱堂文集》卷二,清康熙刻本。

巩为一,可与归有光并肩:“其经、纬史学有原本,而辞之雄放,不异万斛涌泉,其神韵悠扬,体制紧严,则又庐陵、南丰合为一人也。近代归太仆而后,目中实罕其俦。”^①嘉道年间文人吴德旋则将之与汪琬一同目为震川一脉继承者:“论者以为吴中古文家,自归震川后,若文甫草可以继之。”^②另一嘉道年间文人李祖陶赞其“行文善于摆脱,高洁不群,在震川一派中,可云绝肖。特震川养之至熟,气象较为淳涵,改亭掺之至神,风神弥觉横逸耳”^③。计东甚为推服同是学归的汪琬,学文得其“勉励而绳削之者,无有不至”^④,主张道文合一、气骨相融、才法并重,这是二人为文的共识,但同中又见异。从学养和风格上,二人各有得力之处。汪琬远仿庐陵,近摹震川,为文注重文法,强调雅驯,这也是他倡导清文的重要主张。计东称赏“文教渐修复,风气将还醇”^⑤的清初文风,为文呈现醇正和雅的特质,就这一点而言“为文当无有不似茗文者”^⑥,也称赞汪琬文章“溯宋而唐,明理卓绝似李习之,简洁有气似柳子厚”^⑦。不同的是,计东并不十分看重文法,认为“文章以道为本,真不易之论”^⑧,引用柳宗元之言,主张为文不应囿于工法,亦不必拘泥于声、色、形:“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⑨他对汪琬过于强调文法略有微词,称其古文“知古人法度,不肯苟且下一笔”^⑩,但显得过于局促,于此显示了同为震川一脉的二人的古文分野。汪琬更重视文法,“无一字之失于滥、行乎当然,以渐进乎自然,既洁且浑,而冲和淡宕以出之,又能加之以裁断之正”^⑪;计东则更突显“才”与“气”,为文浩博、雄放、疏爽,“当其得意疾书,如平原大陆之一望而不可拘也,如长江大川之直下而不可御也,如惊雷闪电之忽至而不可测也”^⑫。康熙朝文人陆奎勋对其《送王藻儒南归序》文风颇为称赏:“往读《改亭集》,华岳应乎金天,直上五千仞,包奇崛而驾峻嶒。河源自高注下,急涡雷震,束以三门砥柱,杀其怒势,后乃豁然奔放,何其气盛而辞达也。”^⑬

汪琬在选辑《改亭文集》并为计东作序时也承认了二人之间的差别,“以不能自壮其气为

歉”^⑭,且认为这是由于二人经历差异所致,而计东则得益于“诗文之以好游而益工”^⑮。他认为,自己在为官前尚能借以翰墨与计东角逐文苑,及至累身于官,则“无由为名山大川千里之游,以壮其气,而开拓其耳目,于是学日益劣,识日益卑,而才华亦渐以凋落”^⑯,自谓愧于计东实多。

为文醇肆兼备,是计东与醇而未肆的汪琬另一不同的书写特质。就古文的醇肆问题,计东曾特意致书魏禧,指论文章得失。计东十分认可和肯定魏禧布衣文士的成就和地位,常与之纵论诗文,所论多有相合之处。二人交流当时古文名家的文风得失,重点讨论了醇肆之辨。郭英德先生认为“肆”与“醇”是布衣之文与缙绅之文的风格之辨:所谓“肆”,指文章表达奇横恣肆,兴会所至,感慨悲愤,畅笔疾书;所谓“醇”,指文章内容醇正雅驯,合乎儒家圣贤之道,且认为清初文坛主之于布衣文人。^⑰学界对此一论述虽未形成共识,然从魏禧、计东、邵长蘅、董以宁等人论文所涉古文家来看,除汪琬外,当时重要的古文家如姜宸英、侯方域、计东、魏禧、邵长蘅、董以宁等皆是布衣身份而立足文坛的。姜宸英之文因兼具布衣与缙绅的双重身份,使得古文在“醇、肆之间,惜其笔性稍驯,人易近而好意太多,不能舍割”^⑱;而汪琬作为缙绅文人,

① [清]王廷扬序, [清]计东:《改亭诗集》卷首。

② [清]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九,清抄本。

③ [清]李祖陶:《改亭集文录引》,《国朝文录续编》,清同治七年(1868)敖阳李氏刻本。

④⑥⑪⑫⑭ [清]董以宁:《计甫草文集序》,《正谊堂文集》,清康熙书林兰荪堂刻本。

⑤ [清]计东:《发辽西行言怀》,《改亭诗集》卷一。

⑦⑩ [清]计东:《钝翁生圻志》,《改亭文集》卷十四。

⑧⑨ [清]陈禧:《三与汪比部论文书》,《燕山草堂集》卷一,清康熙刻本。

⑬ 盛泽镇人民政府、吴江市档案局编:《盛湖志(四种)》(上),第260页,扬州:广陵书社,2011。

⑮⑯ [清]汪琬:《计甫草中州集序》, [清]汪琬著,李圣华笺校:《汪琬全集笺校》(二),第626、6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⑰ 郭英德:《布衣之文:清前期文坛身份意识的强化与文化权力的转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⑱ [清]魏禧:《答计甫草书》, [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上),第24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其文“得力在欧、王之间”^①，却醇而未肆，过于注重文法而不敢“肆”，恰是他过度囿于文法的缘故；侯方域则是以布衣之身畅意为文，随性而发，不受拘束，因而古文肆而不醇；出身布衣的计东作文则既有“醇”的一面，更有“肆”的特质，这与他的文章观念、跳荡不羁的个性以及多年游走南北的经历不无关联。“醇雅有矩矱”^②的书写特质正是官方对他的认可。但实际上，“矩矱”与“肆”是两种矛盾的风格，从官方立场来看，更为看重、着意强调的是“醇雅”“矩矱”一类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文学审美特质。而计东为文“肆”的风格也遭到了魏禧的批评，谓其“文多高论，读之爽心动魄”，过于“肆”的后果便导致“出手易而微多”^③。但客观而言，正是“肆”这一特性，让计东能在既顺应官方“醇雅”文治观念的同时又别出机杼，使其文治观念与古文书写个性兼容并包。

结语

当我们将目光从“国朝三家”移到同时代的其他古文家身上，并由此审视清文由肆转醇的确立过程，计东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从学文路径来看，计东呈现出转益多师、骈散兼学的特点，自谓不擅作骈文的他，对骈文也谈不上重视，但坐馆时又告诫弟子将制艺放在首位。这恰是彼时自幼熟读圣贤书以备科考士人的缩影，骈文学习尤其是八股文体制的研习是必备科目，无论日后如何转攻古文，早年无不浸染八

股之中。在计东的书写中，尚可从诗歌中看出他应试新朝后内心的种种挣扎和苦痛，然在文集中似乎看不到这种情绪，纵使不得再入闈策，也很难见到他对统治者的怨怼之词，更多的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懊恼和自嘲，且会从深为理解的立场对待官方朝廷文化政策，积极为“盛世之文”张帜，诸多文章观念显示出与后来官方文治相映照的特质。他根柢六经，有意重构唐宋古文，并向“盛世之文”靠拢，创作呈现出醇雅的文风，加之跳荡不羁的个性和多年坎壈游走的经历，又增加了“肆”的特质，这使他在清初一众古文家中独树一帜。深入考察计东的文章观念及其文学书写，无疑可为清初古文定界、评估提供另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参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14ZDB07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初文人‘游走’与文学世界建构”（22BZW1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金苗，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文化与文学。

①③ [清]魏禧：《答计甫草书》，[清]魏禧著，胡守仁等校点：《魏叔子文集》（上），第24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

② [清]黄之隽编纂，[清]赵弘恩监修：《（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五，清乾隆刻本。